

第一章 经济心理学的基本假设

幻想是诗人的翅膀，假设是科学的天梯。

——歌德



教学目标

1. 理解资源有限与欲望无穷的核心矛盾及其对经济心理学的影响。
2. 了解人类理性观的历史演进及其规律。
3. 理解有限理性革命的意义及主要代表人物的观点异同。
4. 理解主体对等性假设的内涵及其意义。
5. 理解效率与公平的价值悖论及其当代意义。

任何一门学科都有自己的基本假设，即关于这个世界的基本信念和观点体系。基本信念是指它相信什么东西对于人类生活是重要的，观点体系是指关于这些重要东西的不同观点。前者规定了这门学科的研究范围及领域，后者规定了这门学科解决的基本矛盾和一般问题。基本假设既是一门学科赖以存在的基石，又是其检验和回答的终极命题。“没有理论的数据就像没有父母的婴儿，注定是短命的”（Gigerenzer, 2000/2006），同样地，没有基本假设的学科就像一个流浪汉，注定是无家可归的。因此，学习一门学科首先要从其基本假设开始，给这门学科安个家，为学习后续的内容做好铺垫。

经济心理学的基本假设既关乎物质世界，又关乎人。它以“资源有限，欲望无穷”为本体论根基，通过“理性假设”搭建破解资源和欲望悖论的个体决策分析框架，借助“主体对等性假设”构建市场有效运行的制度护栏，最终在“效率与公平”的价值博弈中探寻满意解，从而形成解释经济世界的“四维假设”逻辑链。这一逻辑链条既通过经济学的理想化假设剥离现实复杂性，又通过心理学的修正弥合假设与现实的鸿沟，最终在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动态平衡中，为人类社会的经济选择提供兼具解释力与改造力的分析范式。

第一节 资源有限，欲望无穷：本体论根基

经济心理学最基本的假设是“资源有限，欲望无穷”。资源有限是关于物质世界的基本判断，更多地源于经济学；欲望无穷是关于人的基本判断，更多地源于心理学。二者形成了一对尖锐的矛盾，需要一大类学科来探讨，于是就产生了经济学及其相关学科。一般而言，这类学科都是关于人们如何和应该如何有效配置以及利用有限资源去满足无穷欲望的

学科。

上述两个基本判断是经济类学科的两块基石，缺一不可，任何一个不成立，此类学科就没有必要存在了，其重要性就大大降低了。如果资源是无限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就不存在如何配置和利用的问题，此类学科就没有必要存在了。即便资源是有限的，如果人的欲望也是有限的，二者匹配起来不那么困难，尽管可能还需要此类学科，但其重要性及学科地位就大大降低了。正因为资源是有限的，欲望又是无穷的，二者形成了尖锐的矛盾，经济类学科才显得如此重要。

为什么说这八个字是经济类学科的基本假设？因为并非所有学科或所有人都承认它。例如，文史哲类学科可能不关心物质资源的问题，高科技类学科可能不认为物质资源是有限的。也有些学科或人不同意欲望是无穷的。例如，很多宗教人士不同意这一点，佛教徒认为他们的物质欲望非常有限，普通人也会认为自己的物质欲望很容易满足。所以，这八个字是经济类学科的基本假设，凡是从事此类学科研究的人都必须承认这一点。

一、关于资源

当人们高度关注物质资源并相信其有限的时候，资源就非常重要了。从古至今，随着生产力持续提高和科技不断进步，人们心目中的资源也在不断变化。这就涉及资源观的问题。资源观是指人们头脑中关于客观资源状况及其价值的认识 and 观点。一个人认为什么是



资料 1-1

资源、什么资源有价值，他就会围绕这些资源开展经济活动、进行研究，形成理论。从历史上看，资源是不断演变的，资源观也是不断演变的，由此带来了人类经济活动的不断进步，也导致了经济学及相关学科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不断发展。大体上说，迄今为止人类资源观经历了从“物竞”到“心竞”跃迁的六个阶段（Liu, 1993）。

（一）三分说：劳动力、土地、金钱

在农耕文明主导的奴隶社会与封建社会中，人类经济活动围绕劳动力、土地、金钱三大基础资源展开。土地作为不可移动的生产资料，既是财富之母（钱穆，2012），也是社会分层的工具（赵冈，陈钟毅，2006）。劳动力作为生产活动的能动载体，其投入效率直接影响产出（李根蟠，2010）；明清时期玉米的引入使中国土地承载力提高了 50%，支撑人口突破 4 亿（何炳棣，2019）。而金钱作为资源交换的价值尺度，从贝币到金属铸币的演变加速了流通，唐代“两税法”将实物地租转为货币地租，宋代开封城地价达每亩 200~300 贯，凸显金融杠杆的萌芽（程民生，2021）。

三要素的互动塑造了独特的经济逻辑：土地与劳动力的比价变化（秦汉 1 亩耕地需 1 人年投入，明代降至 0.4 人）反映技术进步对要素结构的重塑（吴慧，2016）；金钱与土地的转化机制（商人需 200 石粮食兑换 10 万钱购置田产）暴露资本向土地渗透的必然性（彭信威，2020）；而生态承载极限（明清黄河流域人口突破 150 人/平方公里）则揭示刚性资源约束下的社会危机（曹树基，2001）。这种以资源占有为核心的经济模式，既催生了“资源诅咒”（Auty, 1993），如土地集中既加剧了关中平原的社会矛盾（秦晖，2010），也孕育了

贸易创新,如东南沿海资源匮乏促使海上丝绸之路得以发展(李伯重,2010),最终在工业革命的技术跃迁中土崩瓦解,为现代要素引入埋下伏笔。

(二)四分说:劳动力、资金、土地、管理

随着生产力的不断提高,人们发现商品交换可以带来收益。当商品经济突破自然经济的桎梏,生产要素的范畴从静态占有转向动态运营。管理作为第四要素应运而生,标志着经济活动从“资源禀赋竞争”向“资源配置效率竞争”的范式转型。在传统三分说框架下,两个条件相近的地主可能因管理能力的差异导致天壤之别的结局:明代徽商汪氏家族通过“伙计制”管理创新,将土地、资金与雇工的效率提升40%(张海鹏等,1995),而同期晋商部分家族因守成式经营导致资产缩水50%(张正明,1995)。这种管理效能的落差,使人们意识到:管理不是简单的劳动要素叠加,而是通过组织、协调、创新将劳动力、资金和土地转化为实际生产力的催化机制。

管理要素的崛起,本质上是对资源—效率关系的重新定义。从威尼斯商人的合伙契约到数字时代的平台经济,管理始终在重塑要素组合的边界与可能性。正如诺斯(North,1973)所言:“有效率的经济组织是经济增长的关键,而管理正是经济组织的操作系统。”

(三)五分说:劳动力、金钱、管理、原料、设备和技术

到了资本主义初期的工业时代,劳动力、金钱和管理依然是重要的,但土地的重要性降低。当工业革命的蒸汽机轰鸣声撕破农耕文明的帷幕,经济竞争的底层逻辑发生了根本性转变。土地不再是财富的终极象征,取而代之的是以劳动力、金钱、管理、原料、设备和技术为核心的新型要素。这种转变在19世纪英国纺织业中体现得尤为明显:曼彻斯特棉纺厂主发现,即便拥有同等规模的劳动力和资本,采用珍妮纺纱机与蒸汽动力的工厂,其原料消耗效率比传统水力纺纱机提升400倍,而管理更优的工厂单位成本可再降低25%(Berg,1994)。

这种要素组合的革命性变化,彻底重塑了经济地理版图。利物浦因棉花贸易而崛起为世界工厂,底特律凭借汽车技术专利垄断全球市场,而孟买因失去原料控制权从棉纺织中心沦为殖民地经济附庸。五要素的动态平衡与博弈,既推动人类财富呈指数级增长,也埋下了资源枯竭、生态崩溃与技术失控的深层危机。

(四)六分说:劳动力、金钱、管理、原料、设备和技术、时间

随着工业生产的规模和技术水平的不断提高,效率成为重要问题,时间作为一种资源的价值凸显出来。在农耕生产时代,受自然气候变化规律的限制,生产活动和生产量与时间的关系不大,人们无法通过调控时间来改变收成。但在工业时代,时间就是金钱,也被纳入经济考量的范围,成为经济活动的第六要素。在曼彻斯特棉纺厂轰鸣的蒸汽机旁,工人们被机械钟表切割成精确的劳动单元。1833年英国《工厂法》首次以立法形式规定工人每日工作12小时,这种对时间的暴力规训,标志着时间从自然馈赠转化为商品化的生产要素(钱乘旦,许洁明,2007)。正如马克思(1867/2004)在《资本论》中所指出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进步,不仅体现在剩余价值的榨取,更在于将时间本身异化为可计量的资

本增殖工具。

时间要素的崛起，本质上是人类突破生物钟限制、构建人工时间秩序的文明跃迁。从蒸汽机车的准时发车到区块链的全球共识机制，从福特流水线的节奏管控到元宇宙的虚拟时间流，时间已演变为支配现代经济的显性资源。

（五）七分说：人力、金钱、管理、原料、设备和技术、时间、信息

进入后工业时代的信息社会，原料、设备和技术也相对不重要了，信息成为最重要的资源。信息本身是一种生产要素，可以带来经济效益，而当其沉淀、集成为稳定的、系统的知识时，又可以升级为更高形式的生产要素，进一步带来经济效益。当今社会人们在互联网技术和 AI 领域展开的竞争，很大程度上就是信息技术和知识的竞争。当数字文明重塑全球经济版图，信息从传统生产要素的附属品跃升为核心驱动力，标志着人类进入“数据—知识”双螺旋驱动的新经济形态（Castells, 1996）。信息处理能力已超越土地、设备等传统要素，成为价值创造的主导力量。

信息要素的崛起，本质上是一场认知革命。当微软研究院用 GPT-4 模型在 3 分钟内完成传统团队需 3 个月才能完成的专利分析时，当美联储通过高频交易数据预判经济危机时，人类正在见证知识生产方式的根本性变革。正如凯利（Kelly, 2016）预言的那样，未来属于会与机器合作的人，而知识将成为新的“氧气”——它无处不在，却无法独占。这种要素范式的跃迁，既带来指数级增长机遇，又暗含数字达尔文主义的生存危机。

（六）八分说：人力、金钱、管理、原料、设备和技术、时间、信息、心智

以上讲的资源都是偏向于工具化意义上的资源。即便是人力、管理这些似乎包含人的因素的资源，也被作为提高生产效率和经济效益的工具来看待，较少关注其潜在的能动价值。当数字文明与生物科技交汇，人类首次将目光投向自身最隐秘的心智资源，在心理学上被称为心理资本（psychological capital），在众多社会科学中被称为心智模式（mindset）。这种无形却具有决定性的要素，正在重构经济活动的底层逻辑。在硅谷与华尔街的博弈中，拥有相同技术专利和资金规模的企业，因创始团队心智模式的差异，可能走向截然不同的命运：OpenAI 团队凭借价值对齐的认知框架，将 AGI（通用人工智能）研发导向安全可控路径；而某些 AI 公司因技术至上的思维定式，陷入伦理争议与监管围剿。这种分化印证了德鲁克（1999/2006）的预言：知识工作者将成为新经济的主体，而心智模式决定知识运用的效能边界。



心智资源的崛起，标志着经济学从“物竞天择”向“智竞心择”的范式转换。DeepMind 的 AlphaFold 破解“蛋白质折叠之谜”，其本质是机器心智对生物心智的超越；而当人类开始用脑机接口直接传输概念而非语言时，传统的知识生产体系将彻底重构。在心智资源主导的新经济纪元，认知的清晰度与思维的开放性，将成为比资本更稀缺的战略性资产。

可以发现，尽管在资源观演变的不同阶段，都包含了劳动力或人力资源，但在不同阶段其含义不尽相同。农耕和工业时代的劳动力主要是从事体力劳动或简单技术工作的人，后工业时代的人力主要是指掌握复杂技能和知识的专业人才。未来经济发展中的人力可能

还需要关注技能和知识外的心智资源。资源观的演变从人开始，最终还要回归到人，因为人才是所有资源能动的配置者和使用者。

二、关于欲望

无论经济学家如何认识资源及提出的资源配置方案是什么，真正检验其对错的不是它看起来多么天衣无缝，而是它能否最大限度地满足人的欲望。因此，除了关注物质资源的配置和利用问题外，还必须关注人的欲望及其变化规律，而欲望及其变化规律又是人性中最深刻、最复杂的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说，经济类学科是关于人性复杂性的学科。

（一）人的欲望既没有穷尽，又复杂多变

欲望是人类所有心理现象中最深藏不露、骚动不安的力量。人类的演化史告诉我们，人们的欲望没有穷尽。先前的欲望满足了，又会衍生出新的欲望，人类生生不息，从来没有停留于某种欲望而裹足不前。在心理学中，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告诉我们，潜藏于冰面下的欲望连当事人都无法意识到，却是驱动人类行为最强有力的因素，凸显了欲望活动的隐蔽性。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告诉我们，低层次需求被满足后就会产生更高层次的需求，且不同层次需求之间是相互作用的。低层次需求可能影响高层次需求，高层次需求也会影响低层次需求，凸显了欲望活动的复杂性。

人类欲望如同宇宙中的暗物质，既构成文明演进的底层逻辑，又保持着永恒的不可测性。从原始部落争夺火种到硅谷争夺算力霸权，从弗洛伊德笔下的本我冲动到互联网算法编织的欲望幻境，这种看似简单的心理现象始终在生物本能与社会建构的张力中不断裂变。

（二）欲望是经济活动的原动力

欲望是人从事经济活动的原动力。如前所述，人是所有资源能动的配置者和使用者，其中一个原因就在于人是有欲望的。在经济类学科中，欲望不是个贬义词，永远不要认为欲望是需要被抑制的，恰恰相反，它是需要被激发和调动的。没有欲望，人们就不会积极开展经济活动，经济就会停滞不前，甚至倒退和衰败。我国改革开放后，搞活经济，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其实质就是激发和调动了人们的欲望，推动了四十余年来的经济大发展。不仅如此，欲望还是几乎所有人类创造活动的原动力，没有欲望，人类就无法进步。西方的中世纪，压制人的欲望造成了千余年的沉闷，乏善可陈。我国的封建社会也是如此，持续的时间更长。因此欲望是把“双刃剑”，它可能是罪恶的渊藪，也可能是人类的福音。关键在于如何引导欲望，让人们去做造福于人类的事情，而不是一味地压制人的欲望。

欲望作为经济活动的原动力，其本质是人类文明存续的底层操作系统。从两河流域的物物交换到区块链智能合约，从农耕文明的生存欲求到数字时代的符号消费，欲望始终在驱动经济系统的熵增与重组。这种看似简单的心理现象，实则体现了文明演进的核心算法——当苏美尔人在泥板上刻下第一笔借贷契约时，驱动他们的不仅是生存需求，还是对财富积累的永恒渴望；当深圳华强北电子市场彻夜通明时，迸发的不仅是生产力，更是被压抑数十年的创造欲与获得感。

（三）欲望是经济活动的归宿

满足欲望是所有经济活动的终极目标。从经济实践的角度看，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引古谚道：“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古今中外、男女老少，没有哪个人、哪个群体的经济活动不是为了满足欲望。小到个人、家庭、组织，大到地区、国家，所有围绕经济问题的勤勉努力、苦心经营、宏观谋划，都是为了满足欲望。区别只在于是为了满足一己之欲，还是满足大多数人的共同欲望。从经济类学科研究的角度看，无论学者们的理论观点有多么不同，研究内容有多么高深莫测，提出的模型有多么光鲜亮丽，最终也都要落实到满足人们的欲望上。遗憾的是，无论在经济实践中，还是在学术研究上，都有一些人从满足欲望的初心开始，最终却背离了初心。这就涉及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人们有足够的能力来满足自己的欲望吗？本章的第二节将深入探讨这个问题。

三、经济学 × 心理学 = 经济心理学

用有限资源来满足无穷欲望并非轻而易举之事，甚至是世界上最困难的事情之一。它既涉及人们对资源的认识能力和水平，又涉及人们对欲望及其变化规律的认识能力和水平，还涉及人们对资源和欲望之间关系的认识能力和水平。一般而言，经济学擅长资源及其配置和优化问题的研究，偏重于从资源变动的客观指标推导和预测客观的经济后果；心理学擅长人们欲望及其变化规律的研究，较为关注资源变动客观指标的主观后果。这并非说经济学家对人们的欲望及其变化规律一无所知、目中无人，也并非说心理学家对资源及其配置问题一无所知、心中无物，但相对而言，经济学在资源配置和优化问题上更有优势，而心理学在欲望变化规律问题上更有优势。因此，当面对有限资源和无穷欲望之间的尖锐矛盾时，两个学科有机结合，取长补短，更有利于找到解决问题的最佳方案。

这样一来，偏重于资源配置的经济学和偏重于欲望变化的心理学交叉融合，就产生了一个新的分支学科：经济心理学。这种结合不是简单的相加，而是复杂的相乘。人类的福祉既需要经济学来研究资源配置问题，又需要心理学来研究欲望变化规律，但更重要的是如何让资源配置适合人们的欲望变化。经济学召唤心理学，心理学召唤经济学，只有两个学科遥相呼应，相互结合和渗透，才能更好地用有限的资源去满足无穷的欲望。

第二节 理性假设：个体决策的分析框架

人之所以是所有资源能动的配置者和使用者，还因为人是万物之灵，是有理性的。那么，人的理性足以保证他们用有限的资源满足无穷的欲望吗？这是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一方面，人的理性是有限资源和无穷欲望矛盾的能动的调节者，很大程度上影响这对矛盾带来问题的严重性，或其给人类施加压力的大小。另一方面，如同资源和资源观并非完全一致一样，理性和理性观也并非完全一致。普通人如何看待和评判理性，就会付诸什么样的经济实践；经济学家如何看待和评判理性，就会构建出什么样的经济学体系。普通人也好，经济学家也罢，他们关于人的理性的观点各不相同，所以才会有五花八门的经济实践和理

论，这个世界才会呈现纷繁多样的经济活动画面。

人们关于人类理性的基本信念和观点体系在经济学和心理学中被称为理性假设。之所以是假设，是因为每个人的信念和观点体系都是自己关于人类理性的主观认识，未必符合实际，也不代表别人的信念和观点体系。纵观人类发展的历史，人类的理性观此起彼伏，不仅影响了人类经济发展的进程，还影响了人类文明发展的方向。

本节首先简要介绍人类理性观的演变历史，重点阐述衍生于当代认知心理学而彰显于经济学的有限理性革命是如何给传统经济学涂上浓重的心理学色彩，从而推进经济心理学发展的。

一、人类理性观的演进历史

人类理性观的演变构成了一部跨越三千年的思想史诗，大体经历了轴心时代的理性觉醒、封建社会和中世纪的王权和神权压制、近代理性启蒙的狂飙突进，以及当代认知科学对理性边界的祛魅四个阶段。

（一）轴心时代的理性觉醒与多元绽放

在公元前 8 至前 3 世纪的轴心时代，中国先秦诸子与古希腊雅典智者跨越地域分野，共同完成人类理性的首次觉醒。黄河流域的士人以“天人合一”思想构建伦理秩序，爱琴海畔的哲人借“认识你自己”叩问存在本质，虽路径各异，却同以理性为尺，丈量文明跃升的高度。

1. 中国先秦：实践理性的多元奠基

中国先秦时期的理性觉醒，以“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为核心，呈现伦理理性与实践智慧的深度融合（吕思勉，2020）。儒家以“仁”构建伦理秩序，孔子通过“克己复礼”将血缘亲情扩展为“泛爱众”的社会规范，其弟子编纂的《论语》以对话体记录道德推理过程；道家则以“道法自然”解构传统认知框架，老子《道德经》提出“道生一”的宇宙生成论，主张通过“涤除玄览”的直觉把握本质，庄子进一步以“逍遥游”消解世俗价值；墨家创立逻辑学体系，通过光学实验与力学研究开创实证科学传统；法家则以“法、术、势”构建工具理性，强化集权治理。军事领域，《孙子兵法》提出“知己知彼”的决策框架，其“五事七计”模型整合了政治、地理、人事等变量，体现早期系统工程思维（冯友兰，1948/2012）。这些思想共同构成中国独特的情境化实践理性，为后世的经世致用文化奠定基础。

2. 古希腊雅典：逻辑理性与民主政治的共生

雅典城邦通过民主制度与科学范式的双重突破，确立理性至上的文明范式。在民主政治中，公民大会与陪审法庭的制度化协商，将理性对话嵌入公共决策；在几何学领域，欧几里得的《几何原本》构建了公理化体系，奠定了西方科学方法论的基础；在天文学中，阿里斯塔克斯提出“日心说”雏形，通过几何模型与观测数据整合挑战“地心宇宙观”。哲学三杰则构建理性认知层级：苏格拉底以“知识即美德”追问真理，柏拉图用“理念论”划分感性—知性—理性三阶，亚里士多德创立三段论与四因说，形成逻辑学与因果解释框

架（罗素，1945/2012）。这种理性观兼具逻辑思辨与民主实践的双重品格，成为西方文明的思想源头。

中西两大文明虽路径迥异，却形成互补格局：中国理性扎根礼乐传统与农耕文明，强调伦理秩序与社会和谐，注重现实问题的情境化解；西方理性孕育于城邦民主与海洋贸易，追求超验真理，发展出形式逻辑与科学方法论。二者共同构成人类早期理性探索的两种原型。

（二）中国封建社会和西方中世纪的王权和神权压制

在人类文明的坐标系中，中国封建社会与西方中世纪虽分处亚欧大陆两端，却在权力对思想的规训轨迹上呈现惊人的相似性。当王权的威严与神权的神圣交织成密不透风的穹顶，理性探索的光芒便在这双重笼罩下渐次黯淡。

1. 中国封建社会：王权压制理性

汉代董仲舒通过“天人三策”确立“君权神授”理论，将儒家伦理与天命观深度融合，形成“天不变道亦不变”的意识形态框架（范文澜，2010）。自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主张后，儒家思想从学术流派升格为国家意识形态，逐渐形成系统性理性压制机制：① 经学垄断：汉代设立太学、推行五经博士制度，将《春秋》大一统思想与皇权合法性绑定，知识生产完全服务于统治秩序。② 科举驯化：隋唐确立科举取士制度，以八股文格式固化思维模式，士人阶层沦为天子门生，如范进中举后的精神异化成为典型缩影。③ 技术抑制：汉代“挟书律”导致科技典籍散佚，张衡地动仪等重大发明被斥为奇技淫巧，理性探索空间被压缩。④ 宗法控制：宋明理学将“三纲五常”提升为宇宙法则，通过宗族礼法渗透至基层社会，女性被“三从四德”剥夺教育权，“郭巨埋儿”等极端孝道案例显示伦理异化对理性价值的漠视（翦伯赞，2007）。

2. 西方中世纪：神权统治理性

基督教通过神学系统性贬抑人类理性：① 信仰对理性的制度性压制：阿奎那在《神学大全》中提出“信仰高于理性”，宣称“神学真理需信仰先行，理性仅作辅助”。宗教裁判所将日心说等科学理论定为异端，布鲁诺因挑战“地心宇宙观”被焚。② 认知能力的原罪化：奥古斯丁“光照说”宣称人类理性因原罪蒙蔽，唯有通过神启才能认识真理。德尔图良的名言“正因其荒谬，我才相信”否定理性判断价值。犹太谚语“人类一思考，上帝就发笑”本质是神权对人类认知能力的嘲弄。③ 经院哲学的方法论困境：学术研究沦为神学注脚，如安瑟伦试图用逻辑“证明”上帝存在，实则陷入循环论证。培根倡导的实验科学被斥为巫术，导致光学、力学研究停滞（罗素，1945/2012）。

儒家以“伦理理性”强化社会等级，将技术贬为奇技淫巧，基督教以“信仰理性”否定现世探索。二者虽路径各异，却在“权力规训认知”这一功能层面呈现出跨文明的共性逻辑：当思想的火种需要依赖权力的烛芯才能存续，当认知的边界被权力的戒尺反复丈量，人类对世界的理解便不可避免地陷入停滞。这并非中西文化的特有宿命，而是前现代社会的普遍困境。^①

^① 此部分援引相关史实旨在进行类型学分析，以抽取前现代权力结构压制理性的共性机制，而非对中西文化进行平行比较或价值判断，相关论述仅为后文阐释“有限理性”提供历史参照。

（三）近现代的理性复兴和万能论

文艺复兴以人文主义为矛，刺穿神权桎梏；以实验科学为盾，重构认知范式。这不是简单的古典复兴，而是一场颠覆性的理性革命。从“人的发现”到“自然的解蔽”，从经验观察的萌芽到数学理性的崛起，近现代文明在挣脱神学枷锁的同时，悄然埋下了理性万能的种子。

1. 文艺复兴：人文主义的觉醒与实验科学的奠基

近现代的理性观肇始于14—16世纪西方的文艺复兴。一些有识之士打着“复兴古希腊雅典文明和文化”的旗号，实际上是要把人类从上帝的束缚和禁锢中解放出来，恢复人性，回归理性（伯克，1972/2007）。① 人性解放与神权祛魅：文艺复兴以人文主义为核心，主张回归古典，实则打破中世纪神学枷锁。但丁《神曲》以隐喻解构教会权威，彼特拉克的十四行诗颂扬世俗情感，薄伽丘《十日谈》揭露教会的虚伪，共同推动“人的发现”。达·芬奇将艺术与科学融合，通过解剖学研究揭示人体结构，其手稿包含飞行器、水利工程等设计，体现经验观察与创造性思维的结合。② 科学方法的初步构建：伽利略开创实验科学范式，通过斜面实验量化自由落体运动，利用望远镜观测木星卫星、月球环形山，为哥白尼“日心说”提供实证支持，颠覆亚里士多德物理学。其著作《关于托勒密和哥白尼两大世界体系的对话》成为科学理性对抗神学教条的标志。③ 技术赋能认知：望远镜、显微镜等新工具扩展人类感知边界，推动了天文学、解剖学的突破，为科学革命奠定技术基础（布克哈特，1860/1997）。

2. 启蒙运动：理性帝国的构建

（1）理性至上的哲学基础：启蒙思想家以牛顿力学为范式，将自然与社会纳入理性分析框架。伏尔泰宣称“宇宙是精确的钟表结构”，拉美特利以机械论解释生命现象，霍尔巴赫否定神学目的论，主张自然规律自主性。笛卡尔“我思故我在”确立理性自明性，康德提出“敢于认知”，呼吁公众运用理性摆脱“自我施加的不成熟状态”（罗素，1945/2012）。

（2）概率革命：当文艺复兴运动推翻了上帝，冲破了延续千余年的中世纪宗教和哲学思想的藩篱，问题也随之而来。人们不再相信世界上的万事万物和人的命运是必然的和确定的，而相信世界和人的命运是或然的和不确定的，那么应该如何应对这个全新的世界呢？扔掉了上帝这根拐杖，就需要找到另一根新的拐杖。于是，数学上的微积分和概率论应运而生。牛顿-莱布尼茨的微积分成为描述动态系统的语言；帕斯卡、费马的概率论从赌博分析延伸至保险精算，量化风险，推动资本主义金融创新。孔多塞提出“社会数学”概念，倡导社会科学的数学化，试图以概率模型预测选举结果；魁奈《经济表》用数学模型分析国民经济循环，标志着社会科学向实证科学转型（盖伊，1969/2016）。数学驯服了不确定性，它为人们提供了一整套用来应对或然和不确定世界的方法论和方法。

（3）理性万能论：表面上看，微积分和概率论的产生是数学上的进步，本质上是世界观尤其是理性观的革命（Gigerenzer & Todd, 2002）。一方面，微积分和概率论的产生源于文艺复兴带来的世界观和理性观的巨变，其本身就是数学家们充分发挥理性的体现。另一方面，微积分和概率论的产生推进和加速了延续千余年的中世纪宗教和哲学中必然性梦想和确定性思想的衰落和破灭，为人们应对或然和不确定的世界准备了一整套方法论、方法

和工具体系,成为人们理解世界、开展科学研究及解决实践问题的基本依据。众所周知,数学上的微积分和概率论及其衍生出来的统计学是十分复杂的系统。当人们相信可以和应该仰仗这个系统应对现实世界的时候,就意味着人们相信人的理性是十分强大的。如果说文艺复兴把人推到了前台的话,概率革命就把人的理性提升到了无以复加的高度。人们完全可以仰仗自己的理性,采用这种复杂的方法解决一切问题,包括用有限的资源来满足无穷的欲望。这种理性万能论促成了科学方法论的成熟和知识生产体系化的转型,成为数百年来科学研究乃至人类文明发展的根基。

从文艺复兴的人性解放到启蒙运动的理性帝国,人类用理性之光照亮了蒙昧的深渊,却也在追逐确定性的道路上渐行渐远。概率论驯服了偶然,微积分量化了永恒,但当理性被奉为丈量世界的唯一标尺时,康德笔下的“启蒙困境”与卢梭批判的“工具异化”已悄然浮现(罗素,1945/2012)。这场理性狂飙既铸就了科学革命的辉煌,又暴露了人类试图用逻辑驯服混沌的傲慢——正如帕斯卡(Pascal,1670/1995)所说,人不过是会思考的芦苇,但狂风过处,芦苇的坚韧终将接受火与真理的淬炼。

(四) 当代理性观:有限理性革命

启蒙运动形成的理性万能神话,在20世纪中叶遭遇了系统性的质疑。心理学以解剖刀般的实证方法,将理性至上的神话层层剥开。这场始于认知实验室的静默革命,动摇了经济学大厦的根基,迫使人类重新审视理性王国的边界。

1. 有限理性革命的缘起:强势理性观的困境

自从启蒙运动以来,人们一直沿着其所开辟的理性之路孜孜不倦地构筑着人类知识体系和文明的大厦,同时也构筑了经济类学科体系的大厦。然而,当人们沿着这条理性之路创造了一个又一个人类文明和文化的奇迹时,也发现其带来的问题越来越多,越来越明显。概括起来,有以下几点:①现实生活中很少有人愿意或实际上是按照概率论和统计学给出的方法和工具来做出决策和解决问题的;②有些人想要采用这种方法和工具做出决策和解决问题,却显得力所不及;③即便少数人愿意、也能够采用这种方法和工具做出决策和解决问题,但并非都能产生理想的结果;④最重要的是,由于这套方法和工具奠基于人类中心和理性至上的信念,打着科学的旗号,且确实给人类文明和进步带来过巨大福祉,所以很容易让人们忽视其存在的问题及潜藏的危险(Weber,1919/2004)。且不说它可能让人事倍功半,付出不必要的代价,最大的危险在于,当人们把一种方法和工具奉为神明时,这种方法和工具的作用跟上帝的作用就并无二致了,它会把人带入远离现实的迷离状态。更进一步说,当人类中心与理性至上的结合固化成为一种文化无意识时,人类极易陷入认知的“双重僭越”:既僭越了人在自然中的真实位置,又僭越了理性能力的客观边界。这种僭越最终走向生态危机、社会异化与认知困境的三重深渊。

2. 理性万能神话的瓦解:心理学对全能理性假设的实证革命

幸运的是,还有心理学。诞生于19世纪中后期的心理学,承续启蒙运动之风,认同其倡导的理性价值,且一直沿着其开辟的理性实证之路,来探索人的心理现象及其变化规律。然而,其研究对象的特殊性使其与启蒙运动的理性观形成了既耦合又矛盾的独特关系。这种张力推动了心理学成为修正启蒙理性局限的关键学科。

当心理学将启蒙运动倡导的实证科学方法伸向人自身时，它继承了启蒙运动的求真精神，却以实证利刃刺破了理性自负的泡沫。一百余年来，心理学学派林立，并非都支持启蒙运动以来的强势理性观。行为主义心理学无视人们头脑中发生的复杂认知过程，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直接否定人们是理性的。这两种理论均由于过于极端且不符合人们的基本常识而相继退出历史舞台。到了 20 世纪中叶，随着信息科学和计算机技术的大发展，心理学理论体系越来越完善，研究方法越来越先进，认知心理学应运而生。

当代认知心理学不仅不否定人的理性，还特别重视人类内部复杂认知过程的探讨，但其揭示和积累的大量事实表明，人类理性远未达到概率论和统计学所要求的水平。其中的一些证据直接指向人类信息加工能力的有限性，如人们的知觉具有选择性、注意范围和短时记忆容量是有限的等；另一些证据则间接表明人们的思维和决策还存在许多偏差或谬误，无法遵循理想化的概率论或统计学规则做出决策和判断。除此之外，还有大量的证据表明，人类的认知活动还会受到主观的非认知心理因素的干扰和环境条件的约束，也使其无法遵循理想化的概率论或统计学规则。正是基于这些事实，加上自己的卓越研究和深入思考，结合哲学和经济学中关于人类理性的不同观点，当代认知心理学先驱西蒙（1957）提出了“有限理性假设”（bounded rationality hypothesis），包含三个基本论断和一个一般性结论。

三个基本论断：

1. 人类理性受认知发展水平的限制。
2. 人类理性受主观因素的干扰。
3. 人类理性受环境条件的约束。

一个一般性结论：

现实条件下人类不足以完成概率论和统计学所要求的运算。

这样一来，心理学用文艺复兴以来备受推崇的理性实证方法对这种方法赖以存在的强势理性观给予了致命一击，掀起了自概率革命以来又一次人类理性观的革命。此次革命与其说是仅仅针对概率论和统计学的标准数理模型，不如说是针对其背后隐藏的强势理性观；与其说是仅仅针对经济学中的此种倾向和做法，不如说是触及了整个科学研究中的此种倾向和做法；与其说仅仅是理性观的革命，不如说也是一次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革命！无论从西蒙及后来研究者所涉及的研究主题的范围来看，还是从这场革命实际波及的学科领域来看，都早已经超出了其原始的语境，深深地影响了经济学乃至整个社会科学的未来发展方向。经此一击，原本以全能神灵假设为主线的铁板一块的万能理性观版图被分裂开来，衍生出了有限理性的分支。它昭示人们：理性当是一盏提灯，足以照亮脚下三步之路；若妄作太阳，必焚尽自身所立之地。这种谦卑理性观或许才是启蒙运动未竟之业的最深刻续写。

为了提醒人们注意人类理性观的变化，吉仁泽等（Gigerenzer et al., 1999）用图 1.1 概括了有限理性革命以来处于持续斗争中的四种主要理性观的僵持局面。它表明，有限理性革命并未从根本上改变传统经济学将人视为全能神灵的理性观。现有的经济学仍然是此种观点占主导地位的经济。无限理性论者无视当代认知心理学发现的有限理性事实，仍然固守原有的无限理性模型。约束条件下的最优化表面上接受认知心理学发现的有限理性事

实，但不愿放弃无限理性模型的思想 and 最优化梦想。所不同的是，出现了与强大的传统无限理性阵营相对峙的有限理性阵营。该阵营也分化出了两个学派：① 侧重于选项加工并强调人们按照满意性（与最优化相对）原则简化目标（选项）搜索和决策的满意性学派，以西蒙和泽尔腾为代表；② 侧重于属性加工并强调人们按照启发式规则简化信息搜索和加工的快速节俭启发式学派，以吉仁泽及其带领的研究团队为代表。此种新兴有限理性观及方法论与传统无限理性观及方法论分庭抗礼的局面，有助于经济学研究者反思以往研究的得与失，找到更为科学合理的研究思想和路线，大大推进了经济学的心理学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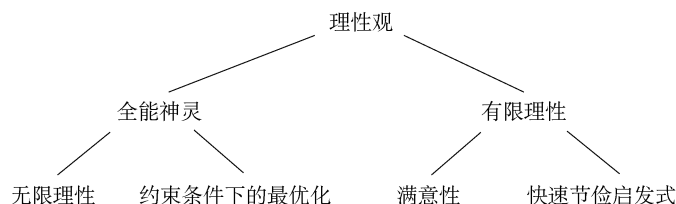


图 1.1 有限理性革命以来理性观的僵持局面

有限理性革命划破了绝对理性的夜空，让经济学从乌托邦式的完美模型回归现实泥泞。人类终于领悟：理性不是征服混沌的利剑，而是照亮迷途的提灯。这场静默的认知革命，既终结了启蒙时代理性万能的傲慢，也开启了跨学科对话的新纪元。在神经科学解码决策机制、复杂系统理论重塑预测范式的今天，有限理性观恰似普罗米修斯的火种，指引着人类在不确定世界中保持谦卑而坚韧的探索姿态。

二、从有限理性研究看经济学的心理学化



资料 1-3

有限理性革命是如何完成的？又是如何引起经济学的心理学化的？这不是一个一蹴而就的过程，而是经过一代代学者的不懈努力而实现的，其中先后有两位心理学家和两位经济学家围绕有限理性假设开展研究而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正是他们的杰出工作促成了有限理性革命和经济学的心理学化。

（一）西蒙：1978 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

西蒙不仅率先提出了有限理性假设，还围绕该假设开展了一系列卓越的研究，形成了完整的思想和理论体系，一举登上了 1978 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神圣奖坛。他的思想和理论体系可以用“有限理性—启发式—满意性—抱负水平”这样一个自洽的逻辑体系来概括：

1. 有限理性

之前，就有人提出过“有限的理性”（limited rationality; Allen, 1932）和“有限的智力”（limited intelligence; Almond, 1945）的概念，主要是指人类的理性或认知资源本身是稀缺的、有限的。为了与此区分开来，西蒙在提出有限理性概念时，选用了“bounded”一词，其用意有二：第一，他不想误导人们将“有限”一词仅仅指向人类理性自身的缺陷，强调人类理性的“受限性”，而非“有限性”。从语义学角度上说，“bounded”一词本身就是“有界限的”或“受约束的”的意思，将其置于“rationality”（理性）一词前面，一点也

没有贬低或否定人类理性的意思。理性受限不是人类自身的过错，所以不能因此而过于苛责或责难人类。第二，“有界限的”或“受约束的”（受限的）理性依然是理性，并非意味着人类面对外部世界束手无策。心理学就是要探讨在此种理性受限条件下人类心理和行为变化的规律。从一定意义上说，理性有限恰恰是心理学存在的原因或前提，用西蒙（Simon，1959）的话说：“认知心理学的全部问题就是有限理性问题。”如同经济学的全部问题就是物质资源有限条件下如何有效配置和利用物质资源一样，心理学的全部问题就是理性资源有限条件下如何有效配置和利用理性资源。如果物质资源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就不需要至少不怎么需要经济学了。同样地，如果理性资源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也就不需要至少不怎么需要心理学了（刘永芳，2022）。

2. 启发式

有限理性召唤并衍生出启发式。“启发式”（heuristic）这个术语起源于古希腊，意指“积极发现或探索”。自18世纪早期被引入英文中后，直到20世纪70年代，它都是指人们用来解决逻辑和概率方法无法处理的问题的一种有用的、甚至不可缺少的策略和方法（Gigerenzer & Todd，2002；刘永芳等，2003）。爱因斯坦曾在一篇物理学论文的标题中使用了“启发式”一词，意指一种观点或方法可能有错误或不完善，却是有用的（Einstein，1905）。20世纪70年代后，启发式这个概念逐渐被引入到心理学和行为决策研究领域。在决策心理学中，所谓启发式，是相对于传统概率论和统计学所推崇的复杂的数理模型和方法而言的，通常是指有机体应对复杂环境的各式各样并非最优化的简单策略、规则、方法和手段，或者说是基于经验或少量信息的简单判断和决策规则。如果说人类理性有限的话，就不得不采用启发式来应对复杂世界；如果人们在现实情境中经常采用启发式的话，就为有限理性假设提供了鲜活的例证。因此，为了充分理解有限理性乃至人类行为，就需要深入探讨人们在复杂情境中是否采用启发式、采用哪些启发式以及这些启发式的功用如何。

3. 满意性

当人们由于理性有限而不得不采用启发式来应对复杂世界时，就不能再用逻辑学和概率论的规则或模型来要求他们，或者说不能用这些理想化的“金标准”（gold standard）来衡量其所作所为是否正确或合理（Simon，1947）。于是，西蒙首创了“满意性”（satisficing）这个术语。所谓满意性，是相对于传统经济学推崇的“最优化”（optimization）而言的，它有两层含义：在应然的意义上，它意味着人们在现实的经济活动中应该追求满意性目标，而非最优化目标。满意远未达到最优，却是有限理性足以达成的目标，也是接近最优化的切实可行的目标。相反，不考虑有限理性的最优化目标不仅难以企及，追逐该目标的过程和结果还常常不能令人满意。在实然的意义上，它意味着人们在现实的经济活动中实际上也是遵循满意性原则来确定目标和采取行动的，而不是最优化原则。当人们这样做时，并非意味着他们心目中没有最优化目标，而是在考虑了各种主客观条件限制后的策略性选择（Simon，1955）。因此，满意性也可以被视为人们应对复杂世界的一种启发式策略。

4. 抱负水平

人们究竟如何确定满意或不满意呢？为了回答这个问题，西蒙（Simon，1955）提出了抱负水平（level of aspiration）的概念，意指人们在从事某项活动时基于各种主客观条件预

先设定的目标水平。虽然它只是一种主观预期和判断,可能高估或低估实际上能够达到的水平,却会极大地影响人们在现实中的选择和行为。当人们的行为结果达到了抱负水平时,就会感到满意;反之亦然。由于人们面临的现实条件及理性水平千差万别,且处于动态发展变化的过程中,所以无法找到适用于所有人和对一个人在所有时空条件下都适用的抱负水平。即便是在特定时空条件下的单个人,由于信息不全或不对称及多种价值目标冲突或不相容,抱负水平设定也是非常困难的(刘永芳,2022)。正因为这样,人类的经济活动乃至所有其他的活动才会呈现丰富多样的复杂画面。

西蒙的思想和理论体系描绘了人类活动的现实画面,是心理学为人类知识和思想宝库做出的最重要的贡献之一,无论对于心理学而言,还是对于经济学来说,都具有巨大的冲击力,打响了有限理性革命的“第一枪”。西蒙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当之无愧,且对于心理学发展具有里程碑意义。这是1879年冯特建立世界上第一个心理学实验室、标志着心理学诞生的第100年时,从经济学这个“老大哥”那里收到的一份百岁纪念大礼,意味着心理学的研究成果受到了经济学这个传统强势学科的认可 and 尊重,对于心理学的未来发展具有重要而深远的意义。

(二) 泽尔腾:199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

西蒙的思想和理论体系深深影响了德国数学家和经济学家泽尔腾。在职业生涯早期,泽尔腾就深受西蒙影响,意识到纯理论的、数理推导式的研究价值有限,要构造有限理性的经济行为理论必须通过实验方法。他早期提出的自然均衡、子博弈精炼纳什均衡、 n 个人博弈等概念和理论,以及晚期开展的大量的实验经济研究,无不贯穿了有限理性思想(Selten,1975)。由于深入探讨了有限理性对企业行为的影响,建立了充分考虑有限理性的决策和博弈理论以及对非合作博弈理论做出了开创性贡献,他于1994年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综观泽尔腾的一生,其思想和理论可以用“有限理性—拇指规则—抱负适应”三个词来概括。

1. 有限理性

作为一个精通数理的主流经济学家,泽尔腾背离了当时的主流经济学,完全认同心理学家西蒙描绘的人类理性的现实画面,深信人的理性是有限的,而基于数理推导和数学建模方法构建的经济学理论是非现实的、不可行的。

2. 拇指规则

泽尔腾(Selten,1998)认为,现实世界中人们的经济行为遵循“拇指规则”(rule of thumb),即简单的经验法则。正像木工经常使用拇指而非尺子粗略丈量木材的长度或宽度一样,经济活动中的决策者也常常采用简单、粗略的经验法则解决现实问题。尽管这种经验法则可能不够精确,但常常是有用的。他的研究无非是把人们在现实博弈情境中可能采用的拇指规则揭示出来,昭示于人。他所说的拇指规则实际上就是西蒙的启发式。

3. 抱负适应

如果说上述两点基本沿袭了西蒙思想的话,抱负适应理论(aspiration adaptation theory)则是对西蒙满意性和抱负水平思想的推进。泽尔腾同意人们是按照满意性原则追求满意性目标的,且是依据主观的抱负水平来确定是否满意的,但他敏锐地意识到西蒙的满意性理

论留下了两个问题：① 它没有回答人们的抱负水平如何变化的问题；② 它只关心单一目标上的抱负水平。于是，他提出了抱负适应理论，构建了多重目标动态博弈模型。

该理论认为，现实决策往往涉及不可公度的多重目标，决策者通过抱负格（aspiration grid）设定局部抱负水平，并依据紧迫性排序进行序列化调整，最终在动态平衡中逼近满意解。其核心机制包括：① 用目标不相容性解释多重目标冲突，如高薪与低压力工作不可兼得，需通过调整优先级实现妥协；② 调整步骤定义局部优化路径，如优先提升紧迫性高的目标阈值，再牺牲低优先级目标；③ 紧迫性排序受时间压力、资源稀缺性及文化约束驱动，短期决策由外部压力主导，长期决策则由内在价值主导。泽尔腾通过柠檬车市场模拟验证了动态调整的生态合理性：买家通过逐步降低非核心指标（如车况）快速锁定交易，决策效率提升 40%；职业决策实验显示，70% 被试者优先调整薪资目标后妥协兴趣，形成“满意性路径”（Selten, 1998）。与西蒙理论相比，该模型从单目标静态阈值升级为多目标动态适配，更贴合复杂现实场景。但理论仍面临计算复杂性和文化差异的挑战，需结合实时反馈机制和文化情境细化模型。总体而言，抱负适应理论揭示了人类在复杂决策中通过局部优化实现生态理性的底层逻辑，为组织管理、公共政策等领域的动态决策提供了方法论。



资料 1-4

泽尔腾雄心勃勃地想要揭示多重目标条件下抱负水平的变化规律，为“理性有限的经济代理人的非最优化行为建立模型”，但正如他自己所说：“迄今为止尚不能声称它是关于决策行为的得到实验验证的描述。实验证据表明它尚需扩展和修正。”（Gigerenzer & Selten, 2001）尽管如此，他提出的思想和所做的努力对有限理性理论的发展提出了新的问题和方向。一个精通数理推导和建模的经济学家，毕其一生致力于用有限理性的观点和方法探讨经济博弈均衡问题，这本身就颇具标志性意义，大大推进了有限理性革命，加剧了经济学的心理学化。

（三）卡尼曼：2002 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

在泽尔腾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仅仅 8 年之后，心理学家卡尼曼就由于围绕有限理性问题开展的卓越研究而登上了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奖坛。作为一个纯粹的心理学家，卡尼曼的研究既承继了西蒙关于有限理性和启发式的思想，又与之有显著的分歧。他的思想和理论体系可以用“有限理性—启发式—认知偏差”三个词来概括。

1. 有限理性

卡尼曼沿用了西蒙的“有限理性”概念，但更关注人类理性或认知资源的稀缺性。也就是说，他更多地看到了“有限理性”这个术语中的“有限”一词，而相对忽视了“理性”一词，因而更强调有限理性导致的负面后果，而忽视其作为一种理性的适应性价值。他认为，人类受限于自身认知惰性，无法进行完全理性计算，不得不依赖简化的心理机制（Kahneman, 2011）。例如，在复杂投资决策中，人们无法全面分析市场数据，不得不依赖直觉判断（Kahneman & Tversky, 1974）。这种局限性导致决策偏离传统经济学的最优化目标。整体而言，相较于西蒙对有限理性的中性态度，卡尼曼更强调其系统性偏差风险，认为这些偏差是非理性的错误，反映了认知机制的缺陷。他的研究围绕揭示人类决策的非理性偏差和机制而展开。

2. 启发式

与他的有限理性观相一致，卡尼曼借助精妙的实验设计，做了大量扎实的实验研究，证明人们常常采用以下一些启发式做出决策，从而背离了科学的决策轨道。

(1) 代表性启发式 (representativeness heuristic): 它是卡尼曼和特沃斯基 (Kahneman & Tversky, 1974) 提出的核心认知机制，是指人们在不确定性决策中，倾向于通过典型性匹配而非统计概率来评估事件可能性。当面临新情境时，个体会快速检索记忆中相似的典型范例，并基于其与原型的相似程度直接推断概率或类别归属，而忽略基础概率、样本规模等关键统计信息。人们在长期生活中会在记忆中积累各种场景下的典型事例，当再次遇到类似事件的时候，他们不会再去收集更多信息，而是直接从头脑中提取出该典型事例，基于它做出决策，其核心矛盾在于认知效率与统计理性的冲突。例如，在医疗诊断中，医生遇到症状与教科书案例高度吻合的患者（胸痛+呼吸困难），可能直接诊断为肺炎，却忽略了该症状组合在普通感冒中的高发率。这种“以典型性替代统计性”的思维模式，本质上是大脑为降低认知负荷而采取的进化适应性策略。

(2) 可得性启发式 (availability heuristic): 它是卡尼曼和特沃斯基 (Kahneman & Tversky, 1974) 提出的另一核心认知机制，是指人们在不确定性决策中，倾向于依赖记忆中最易提取的鲜活案例或近期信息作为判断依据，而非系统分析客观统计规律。当评估某事件概率或风险时，个体会以信息提取的难易程度替代实际发生频率的理性计算。例如，媒体密集报道空难后，人们会因为空难画面更易被提取而高估飞行的危险性，却忽略统计数据中车祸死亡率高 30 倍的事实。这种启发式的本质是大脑通过认知捷径降低决策能耗。人们易受情感强度、媒体曝光或近期经历的影响，导致对罕见风险的过度警惕或对常见风险的严重低估，正如鲨鱼袭击致死案例被反复报道，而溺水死亡的真实数据却无人问津。可得性启发式揭示了人类认知中“易得性即真实性”的深层认知陷阱。

(3) 适应性启发式 (adaptive heuristic)，或称锚定效应 (anchoring effect)，是指个体在复杂决策中依赖初始信息形成判断框架，并通过经验法则快速调整的认知策略。当面临不确定性时，人们会以最先接收到的信息（锚点）为基准，通过局部调整形成最终决策，却忽略全局信息或客观统计规律。例如，早餐店通过预设“加一个还是两个鸡蛋”的提问框架（锚定初始数量），引导顾客在限定范围内选择，而非开放讨论是否需要鸡蛋；在商业谈判中率先抛出高价（锚定价格基准），使对手的还价围绕该锚点波动。这种启发式的本质是大脑通过首因效应建立认知锚点，以降低决策能耗，但其代价是系统性偏差，如消费者因



资料 1-5

商品原价锚定而高估折扣价值，或投资者因历史股价锚定而误判未来走势。正如卡尼曼的实验所示，当要求被试者估算非洲国家联合国席位占比时，转盘随机生成的数字会显著影响其最终判断，凸显锚定效应作为认知捷径的双重性：既提升决策效率，又导致可预测的认知扭曲 (Kahneman & Tversky, 1974)。

3. 认知偏差

卡尼曼的认知偏差观以有限理性为理论基石，揭示了人类决策受制于认知资源稀缺性，不得不依赖启发式等心理捷径进行快速判断，但这种进化适应性策略常导致系统性偏差。其核心观点是，传统经济学假设的完全理性决策在现实中难以实现，因为个体在复杂情境

中更倾向于通过典型性匹配、情感驱动记忆提取或初始信息锚定等非理性方式简化判断，从而偏离统计理性与客观规律。这些偏差不仅体现为对基础概率的忽视、对近期信息的过度加权，还暴露了大脑在信息处理上的根本局限：直觉系统（系统1）的自动化运作常凌驾于理性分析（系统2）之上，形成“易得性即真实性”“锚定即基准”的认知陷阱，最终导致决策偏离最优解（Kahneman & Tversky, 1974）。

卡尼曼的认知偏差理论以双系统思维为核心，揭示人类决策中直觉（系统1）与理性（系统2）的深层冲突：系统1的快速直觉虽高效，却因认知资源有限和进化适应性偏差导致系统性误判；系统2的惰性则使理性校验失效，最终形成锚定效应、框架效应等可预测的思维陷阱。其价值不仅在于解释非理性决策的根源，更在于启发抗偏误策略：通过激活理性反思、构建多元信息校验机制，人类得以在直觉洪流中保持清醒判断。正如卡尼曼（Kahneman, 2011）所言：“认知偏差是有限理性的副产品，承认其存在才是掌控决策的第一步。”

（四）塞勒：201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

深受卡尼曼有限理性观的影响，塞勒提出了“有限理性—心理账户—助推”的逻辑体系，将有限理性理论推广和应用到现实场景的行为干预和政策设计。

1. 有限理性

塞勒继承并发展了卡尼曼的有限理性观，认为人类决策受限于认知惰性与心理偏差，无法完全理性计算。他通过大量“反常行为”挑战传统经济学假设：人们有高估已拥有物品价值的倾向，宁愿保留劣质旧车也不愿换购新车，即使交易能带来净收益（Thaler, 1980）；人们过度重视短期享乐，忽视长期利益；决策常受公平感驱动，如抵制商家哄抬价格，即使自身利益受损（Kahneman, Knetsch & Thaler, 1986）。这些行为表明，传统经济学的理性人假设无法解释现实中的非理性决策模式。

2. 心理账户

塞勒（Thaler, 1985）提出心理账户（mental accounting）理论，揭示人们如何通过主观分类管理财务，导致经济行为偏离理性逻辑：同一笔钱因来源或用途不同被赋予不同价值，如奖金更易被用于享乐消费，而工资则被储蓄；心理账户间资金不可替代，如股票账户浮盈50元与工资收入50元，决策时可能区别对待；人们因前期投入继续坚持失败决策，忽略机会成本。心理账户的运作规则解释了消费、投资等场景中的非理性选择。



资料 1-6

3. 助推

针对有限理性与心理偏差，塞勒和桑斯坦（Thaler & Sunstein, 2008）提出助推理论（nudge theory），主张通过环境设计间接影响决策，而非强制干预：① 默认选项优化，将健康保险、养老金计划等设为默认选项，显著提高参与率；② 简化选择架构，减少决策复杂度，例如简化养老金缴费流程、提供清晰的价格对比；③ 社会规范提示，利用群体行为数据引导个体选择，如显示“90%用户已节能”提升环保行为。



资料 1-7

塞勒的贡献在于嫁接了心理学与经济学，将有限理性理论从学术边缘推向政策实践的前

沿。他的理论证明，承认非理性并非否定理性，而是通过环境设计引导“更好的选择”——正如他所言：“助推不是强迫，而是让正确选择变得更容易。”（Thaler & Sunstein, 2008）这一范式革新，不仅重塑了经济学对人性的认知，还开启了行为科学驱动公共政策与商业实践的新纪元。

总之，西蒙、泽尔腾、卡尼曼与塞勒四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的接力研究，共同构建了经济学心理学化的核心框架。西蒙以“有限理性—满意性”打破传统理性人假设，揭示人类决策的认知边界；泽尔腾将博弈论与有限理性相结合，拓展至动态策略选择；卡尼曼通过双系统思维与认知偏差理论，解析直觉与理性的深层冲突；塞勒则推动行为经济学从理论到实践，以“助推”重塑政策设计逻辑。这一进程不仅颠覆了经济学的完全理性的迷思，还开创了跨学科研究的新范式。其意义在于：经济学从解释世界转向理解人性，承认情感、认知偏差与社会偏好对决策的塑造作用，为公共政策、商业策略和个体选择提供了科学依据。有限理性革命标志着经济学从工具学科向人文学科的范式跃迁，开启了认知科学驱动的经济决策的新纪元。

（五）吉仁泽的理论拓展

继上述四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之后，吉仁泽在有限理性革命中独树一帜，他通过提出生态理性与社会理性理论，将决策研究从实验室拓展到真实世界的复杂环境，进一步说明了传统理性模型的局限性。

1. 创造性地提出了生态理性和社会理性的概念

1) 生态理性：环境适配的进化智慧

吉仁泽（Gigerenzer, 2000）指出，理性应被视为与环境交互的适应性能力，而非抽象的计算能力。其核心观点包括：① 进化决策模式：人类决策机制是生物长期适应环境的结果。② 启发式有效性：简单启发式在特定环境中比复杂模型更高效。③ 生态效度标准：决策合理性取决于策略与环境的匹配度，而非抽象合理性。吉仁泽将进化论引入决策研究，强调人类认知是自然繁衍的适应性产物。例如，医生使用排除法快速筛查罕见病，降低误诊率，体现了环境信息结构的适配性（Gigerenzer, 2007）。



资料 1-8

2) 社会理性：关系网络中的集体智慧

吉仁泽突破个体理性框架，将社会属性纳入理性范畴，核心观点包括：① 情绪作为理性组件：情绪是进化形成的快速决策机制。② 文化演化的作用：在集体主义文化中，社会关系优先于个体利益。③ 社会学习与模仿：人类通过观察他人行为来适应环境。实验显示，70%的求职者会模仿成功者的简历策略。这种社会理性观强调决策是个体利益与社会关系的动态平衡，拓展了有限理性的理论内涵和适用范围。

吉仁泽的生态理性与社会理性理论不仅拓展了有限理性的边界，更揭示了人类在复杂世界中“以简驭繁”的生存智慧。它整合了心理学、生物学、经济学，推动决策研究从实验室走向现实，将理性从计算最优转向环境适配，为行为经济学提供了进化论基础。正如他所言：“理性不是计算的技艺，而是适应环境的艺术”（Gigerenzer, 2000）。

2. 创造性地提出了一系列快速节俭启发式

吉仁泽的快速节俭启发式是人们适应复杂环境的工具箱，强调以最少信息、最短时间实现合理决策，包括以下五类。

1) 再认启发式

再认启发式 (recognition heuristic) 是一种基于环境信息的快速决策策略：当某一选项可被再认时，优先选择该选项；若无法再认，则放弃或随机选择。其机制依赖环境中的自然频数信息，而非复杂计算。例如，医生通过症状匹配常见疾病库进行快速筛查，投资者依赖行业或企业熟悉度选择股票，忽略复杂财务模型。这种启发式通过牺牲部分准确性换取效率，体现了“少即是多”的生态理性原则 (Gigerenzer et al., 1999)。

2) 采纳最佳启发式

采纳最佳启发式 (take-the-best heuristic) 是一种基于单一关键属性的快速决策策略，其核心机制为：识别属性重要性→按属性值排序→逐项比较直至找到“足够好”的选项。该启发式强调在有限信息与时间压力下，优先选择最能满足核心需求的选项，而非追求全面最优。例如，在招聘中，企业可能仅以“沟通能力”为关键指标筛选候选人，而忽略学历等次要条件；消费者则根据价格阈值直接选择商品，放弃对附加功能的权衡。研究表明，这种策略在复杂决策中的准确率常接近甚至超越复杂模型，因其通过牺牲部分信息完整性换取效率，体现了生态理性对环境适配的追求 (Gigerenzer et al., 1999)。

3) 逐项排除启发式

逐项排除启发式 (elimination-by-aspects heuristic) 是一种通过逐步淘汰不符合关键标准的选项来简化决策的启发式策略。其核心机制为：首先确定核心筛选条件，逐层排除低匹配项，最终在剩余选项中随机或均衡选择。该方法通过聚焦关键属性快速缩小决策范围，避免信息过载。例如，租房时优先排除非核心需求，集中筛选预算与地理位置匹配的房源；企业采购则先淘汰资质不全的供应商，再从合格选项中评估性价比。这种策略在复杂决策中可显著降低认知负荷，体现了生态理性对有限信息下的高效适配追求 (Tversky, 1972; Gigerenzer et al., 1999)。

4) 满意性启发式

满意性启发式 (satisficing heuristic) 是一种基于目标阈值的决策策略，其核心在于设定最低可接受标准，一旦发现满足条件的选项即终止搜索。其关键机制在于动态调整阈值：决策者根据环境反馈实时调整目标要求，而非追求全局最优。例如，求职者可能仅筛选薪资大于或等于预期的岗位，而非穷尽所有机会；急诊医生则根据患者症状快速启动标准化治疗方案，避免因过度检查延误救治。这种策略通过牺牲部分最优性换取效率，体现了生态理性在有限资源下的适应性，尤其在信息过载或时间紧迫的场景中能显著降低决策成本 (Gigerenzer et al., 1999)。

5) 社会学习启发式

社会学习启发式 (social learning heuristic) 是一种通过观察并模仿他人行为替代自主决策的适应性策略，其核心机制在于利用群体智慧降低个体认知负荷，如通过口碑传播、流行趋势或社会规范快速获取有效信息。该启发式强调社会互动对决策的塑造作用，如投资者模仿机构持仓调整投资组合，移民通过模仿本地人行为加速文化适应。这种策略的合理

性源于班杜拉社会学习理论中的观察学习机制，即个体通过模仿他人的成功经验提升决策效率，尤其在信息不对称或资源有限的环境中，群体行为可作为可靠的认知捷径（Gigerenzer, 2004）。

吉仁泽的快速节俭启发式体系在理论与实践上均具有突破性贡献：在理论层面，其通过生态效度验证揭示了简单启发式在复杂决策中的合理性，挑战了传统理性假设，构建了融合进化生物学、社会学与经济学的跨学科决策框架。在实践层面，该理论为政策设计提供了科学依据，如政府通过自然频数提示简化健康行为引导，或企业利用采纳最佳规则引导和优化消费者决策，显著降低信息处理成本并提升决策效率。这些成果不仅重塑了认知科学对人类理性的理解，还为教育、医疗、金融等领域的复杂问题提供了“少即是多”的解决方案，推动决策研究从实验室走向真实世界。

三、两条决策路径的比较



综观以上人类理性观的演进史，可以看到，关于人们究竟应该如何用有限资源满足无穷欲望，迄今为止衍生出两条决策的路径。

路径 1 基于启蒙运动以来的无限理性观，主张采用规范的逻辑规则和数理模型，通过结构化建模和优化算法，推导最优方案，强调“真理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路径 2 基于有限理性观，主张采取描述决策模型，通过过程追踪提炼启发式规则，强调“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



可以看到，上述两条决策路径之间的分歧并非像想象中的那样大，它们适用于不同的场景，各有优缺点。在确定性高、参数完备的场景中，路径 1 的统计显著性检验能提供可靠决策支持。在变化复杂、信息模糊的环境中，路径 2 的启发式策略能降低认知负荷，提升响应效率。路径 1 易因过度依赖理想化假设而脱离现实，路径 2 则可能因启发式固化导致次优解。

西蒙的满意性原则与泽尔腾的动态均衡观点为化解上述两条路径的分歧提供了核心方法论：在理论上，满意性原则既承认有限理性的实然性，又以应然性的价值理性为进化目标。例如，决策者可设定满意阈值，在可行解中选择最优，而非追求全局最优。在实践上，可以通过阶段目标拆分，将长期目标分解为阶段性任务，逐步逼近应然理想。企业可以先通过启发式优化短期供应链，再引入 AI 人工智能模型实现长期动态规划，也可以结合结构化模型（路径 1）与启发式规则（路径 2）化解二者的冲突，如医疗诊断中先用决策树筛选高概率病例，再通过专家经验调整，还可以通过抱负适应理论动态调整目标水平，根据实时反馈修正理性边界。

总体而言，作为传统经济学的基石，路径 1 通过数理模型构建了决策的金标准，其逻辑自洽性为复杂系统提供了可解释的优化框架。路径 2 揭示了人类决策的真实图景，其启发式规则通过过程追踪捕捉现实中的适应性智慧。前者追求应然的理性完美，后者直面然的认知局限，但实然与应然并非对立：有限理性是无限理性的演化起点，而无限理性为有限理性提供改进方向。

第三节 经济主体对等性假设：市场有效性的制度护栏

理性假设为经济主体配置有限资源的决策提供了分析框架，但这类决策并非孤立发生。市场中的主体会相互冲突，若缺乏有效的市场机制，无论完全理性还是有限理性，均难以正常发挥作用。经济学的市场逻辑以主体对等性为起点，通过机会公平的规则设计，最终由契约关系保障实施，形成“平等参与—规则约束—责任承担”的闭环系统（Coase, 1960）。这一逻辑体系通过保障理性功能，既构建了经济学的理论基础，又提供了市场有效运行的制度保证。

一、经济主体对等性：市场参与的元规则

与完全理性假设一样，经济主体对等性假设是经济学理论建构的核心预设，也隐含了经济学审视和处理市场关系的态度和原则，是市场机制有效运行的重要前提之一（Smith, 1776）。其本质是将现实市场中的参与者抽象为同质化单元，以此构建市场机制有效运行的逻辑起点。

（一）实质对等：理性与知识的对称性假设

经济学中的理性与知识对称性假设是市场均衡分析的基石，其核心在于默认所有市场主体具备理性决策的同质性与信息获取的对称性。

（1）理性决策的同质性：消费者与企业均被假定为能基于充分信息进行成本收益计算的主体，如默认消费者选择商品时掌握性价比信息，企业决策时拥有市场供需数据。这种同质化理性虽简化了现实复杂性，却为供需均衡、价格机制等理论模型提供了基准框架。

（2）信息获取的对称性：经济学默认市场参与者能无障碍地获取关键信息，如产品质量、技术参数等。然而，有限理性的普遍存在及现实中信息不对称问题对此种理想化假设提出了挑战（Akerlof, 1970），衍生出了形式对等。

（二）形式对等：法律与规则的无差别适用

形式对等强调法律地位与权利义务的无差别适用，其核心在于通过规则中立消解权力、资本等现实力量的非对称性，构建“权利—义务”的均衡生态。

（1）地位对称：《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简称《民法典》）规定“民事主体在民事活动中的法律地位一律平等”，禁止任何一方以权力、资本或信息优势强加意志。例如，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与企业签订采购合同时，不得利用行政职权压低价格。

（2）市场主体的权利与义务对等：如企业享有经营自主权的同时需履行环保义务，消费者享受商品使用权需承担付款责任。失衡将导致契约精神异化，如平台企业单方面豁免责任条款会损害消费者权益。

这种理想化预设虽无法完全消弭现实中的权力失衡，但为市场提供了基准性规则：在契约自由框架下，对等性通过法律强制与技术赋能实现动态平衡，使市场



资料 1-11

机制得以在“差异中追求均衡”的轨道上运行。

二、机会公平：制度设计的公平标尺

主体对等性既为机会公平提供了可能性，也为其提供了必要性（Coase, 1960）。经济学中的机会公平强调市场主体在参与经济活动时享有平等的竞争起点与无偏的规则框架，其核心在于消除因出身、制度性歧视或资源垄断导致的系统性机会差异，确保个体能力和努力成为决定经济成果的核心变量。

（一）起点公平：竞争资格的均等化

起点公平要求社会为所有成员提供无差别的制度准入条件，确保竞争规则对所有人开放。

（1）生产要素获取权平等：所有市场主体在获取资本、土地、技术等生产要素时不受歧视性限制。例如，禁止平台企业利用市场支配地位限制中小商家入驻，以保障各类经营者平等参与市场竞争。

（2）信息透明化：市场参与者需掌握对称信息以做出理性决策。例如，政府采购通过电子化平台公开招标信息，2023 年电子化率达 90%，中小微企业中标率提升至 27%，降低了信息壁垒导致的竞争失衡。教育机会均等要求消除户籍、性别、地域等制度性壁垒，使农村学生与城市学生享有同等升学机会。

（二）规则公平：制度设计的中立性

规则公平要求制度设计不偏向于任何群体，规则面前人人平等。

（1）法律规则普适性：经济规则需适用于所有主体，禁止特权豁免。例如，《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商务法》第 35 条规定“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不得利用服务协议、交易规则以及技术等手段，对平台内经营者在平台内的交易、交易价格以及与其他经营者的交易等进行不合理限制或者附加不合理条件，或者向平台内经营者收取不合理费用”，以此保障平台内经营者的自主经营权。

（2）程序正义：资源配置过程需遵循公开、透明和可验证的程序。如土地出让采用“招拍挂”制度，通过市场化竞价，避免行政干预导致的权力寻租。

（三）能力补偿：结构性差距的矫正

机会公平并非机械的平均主义，而是通过制度设计弥补弱势群体的能力短板。

（1）教育补偿：例如，通过降分录取、定向培养，2023 年我国农村专项计划使农村户籍清北录取率提升至 2.1%，缓解了城乡教育资源配置的失衡。

（2）普惠金融：蚂蚁集团（原蚂蚁金服）旗下网商银行首创“310 贷款模式”（3 分钟申请、1 秒放贷、0 人工干预），利用大数据风控为缺乏抵押物的小微企业提供纯信用融资。截至 2023 年，该服务已覆盖超 5000 万小微经营者，户均贷款额仅 3.8 万元，不良率控制在 1.5% 以内，高效破解了小微群体“融资难、融资贵”的困境。

机会公平的本质是规则正义与结果正义的辩证统一。在数字经济时代，需构建“技术

向善、规则弹性、机会包容”的新型制度框架，包括建立算法伦理审查机制，防止代码霸权侵蚀平等权，推动数字贸易规则改革，平衡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机会分配。机会公平的终极目标是让每个社会成员在“差异中实现平等”，通过制度迭代不断逼近社会正义的理想状态。

三、契约关系：对等性与公平性的制度载体

经济学中的契约关系既是维护主体对等性和机会公平的伦理规范，又是实现主体对等性和机会公平的制度约束，成为交易公平、资源配置的核心工具，其本质是通过责权利的对等分配与程序正义的有力保障，构建可预期的合作秩序。

（一）契约关系的精神实质

1. 契约自由

契约自由是私法自治的核心体现，强调当事人基于真实意思表示自主决定契约关系。其内涵包括：① 意思自治：民事主体依自愿原则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法律关系（《民法典》第5条），有权自主缔约、拒绝强制交易；但自由受法律与公序良俗约束，显失公平的法律行为可撤销（第5、8、143、151条）。② 形式自由：合同可采用书面、口头或其他形式（《民法典》第469条）；电子合同等数据电文视为书面形式，具有法律效力。③ 意志真实：意思表示须无瑕疵，在重大误解（第147条）、欺诈（第148、149条）、胁迫（第150条）、显失公平（第151条）情形下，合同可撤销。如宅基地审批被胁迫低价转让，受胁迫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予以撤销。契约自由既是市场效率的源泉，也是社会公平的调节器（王丽萍，2012）。在数字经济时代，其实现需兼顾形式自由与实质正义，通过技术赋能与社会共治，构建适应新型契约关系的制度框架。

2. 契约平等

契约平等作为现代契约精神的核心支柱，其内涵远超形式上的对等，更强调通过制度设计实现实质公平，其内涵包括：① 法律地位对等性：民事主体法律地位一律平等，禁止基于身份、地域的歧视。通过资质审查制度确保交易方具备对等履约能力，防止弱势方陷入“能力陷阱”。② 权利义务对等性：当权利义务显著失衡时，法律赋予撤销权，如教育机构单方变更培训协议被判无效、《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简称《劳动法》）对农民工工资设置特殊保障条款，突破合同自由限制，实现实质平等。③ 程序性平等保障：强制披露关键条款，消除信息不对称，允许双方对条款进行多轮磋商，如建筑合同通过竞争性谈判确定工程价款。在数字经济时代，契约平等的本质是通过制度设计将技术权利转化为普惠性契约权利，这要求法律体系兼具灵活性与强制性，在保障市场效率的同时守护社会公平正义。

3. 契约守信

契约守信作为市场经济运行的核心伦理准则，既是理性主体在博弈中的最优策略选择，也是法律制度设计的关键目标（Nielsen, 1985）。其本质是通过成本—收益的精确计算与社会信任资本的积累，实现个体理性与集体理性的统一，终极目标不仅是法律义务的履行，

更是通过信用资本积累实现社会合作效率的跃升。在数字经济时代，需构建“法律强制+技术赋能+文化浸润”的三维治理体系，使守信从外在约束转化为内在自觉，最终达成“人人皆为契约守护者”的社会契约文明。

4. 契约救济

契约救济是指当契约关系遭受破坏时，通过法律或社会机制恢复公平秩序的系统性工程，其本质是以制度力量修复受损的社会信任资本，需兼顾个体救济与市场秩序维护的双重目标。现代契约救济已超越简单的损失补偿，转向修复社会合作关系的价值追求。在数字经济时代，需构建“预防性救济”与“修复性救济”并重的体系，使救济制度成为推动契约文明升级的制度杠杆。

（二）契约关系的制度保障

1. 法律框架的强制约束

其本质是通过实体权利校准与程序正义保障，在维护市场效率的同时守护社会公平。在数字经济时代，需构建“法律强制+技术赋能+社会监督”的立体约束体系，使契约自由既成为市场创新的引擎，又不致异化为权力压迫的工具。现代法律框架对契约自由的约束，已形成立法设定底线、技术筑牢防线、社会共治纠偏的立体网络。在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中，需动态平衡契约自由与公共利益：既要防范“算法霸权”异化契约关系，又要避免过度监管扼杀创新活力。通过构建弹性化法律框架，使契约自由在数字经济浪潮中持续释放制度红利。

2. 市场机制的自我调节

其本质是通过声誉沉淀与信号筛选机制，将信息成本转化为竞争优势的过程（Spence, 1973）。在充分竞争的市场环境中，长期博弈形成的声誉资本能够替代部分法律强制约束，高质量主体通过抵押担保、学历证明等信号传递机制，有效破解信息不对称难题。这种调节效能的实现，依赖于两大核心要素：市场厚度与信息透明度。当市场厚度达到临界规模时，声誉机制的威慑力呈指数级增长，如长三角润滑剂产业集群通过 34 家企业技术共享实现劣质企业自然淘汰。信息透明度的提升，如区块链存证使履约记录可追溯性提高 80%（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2023），显著降低了信号传递失真风险。

3. 动态调整机制

其本质是在契约刚性框架内植入弹性基因，通过情势变更原则应对外部突变，借助剩余控制权配置化解内部僵局。在平台经济、共享制造等新业态下，需构建“法律底线—市场弹性—技术赋能”的三维调节体系，使契约既保持稳定预期，又具备应对不确定性的进化能力。未来可探索“契约健康度指数”，综合评估条款灵活性、调整频率、执行成本等维度，为动态调整提供量化依据。

总之，主体对等性作为市场经济的基石，既是理论起点，又是制度归宿。其通过实质与形式对等双重约束，构建市场机制运行的制度护栏，并以机会公平的三维框架确保资源配置以个体能力为核心。在此框架下，契约关系成为对等性的具象载体：它以自由缔约为起点，以平等权利为内核，以信用履约为保障，以救济机制为兜底，最终实现效率与公平的动态平衡（Rawls, 1999）。数字经济时代，主体对等性面临算法“黑箱”、数据垄断等挑

战。区块链技术通过智能合约实现履约自动校验，算法审计破除技术霸权，信用修复机制提供容错空间，推动治理智慧迭代。未来需在法律刚性、技术韧性、社会弹性三维协同中筑牢制度根基，使市场经济从形式对等迈向实质公平。

第四节 效率与公平：价值悖论与动态平衡

新古典经济学以“经济人”假设与主体对等性假设为基石，构建了市场自动均衡的神话。前者将人简化为全知全能的“理性计算器”，忽视有限理性现实；后者将复杂社会关系抽象化，掩盖阶级地位、信息垄断等结构性不平等。这种理论建构与市场现实的背离催生了效率和公平的价值悖论。

一、效率—公平悖论

效率—公平悖论本质上导源于有限资源和无穷欲望的根本性矛盾。古典经济学将完全理性假设锚定于资源一端，以实现资源端的理性化处理，而把主体对等性假设附着于欲望一端，以完成对欲望端的同质化遮蔽，试图通过这两个假设的相互加持来化解资源和欲望之间的矛盾。这种做法不仅忽视了两个假设本身的非现实性，还忽略了它们之间的内在矛盾性。

(一) 理论建构的逻辑断裂

1. 价值内核的不可通约性

效率以帕累托改进为衡量标准，追求资源配置的边际效用最大化（Arthmar，2016）；公平则强调正义原则下的机会均等与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利益（Rawls，1999）。两者分别根植于边沁的功利主义与康德的义务论，形成价值判断的“阿喀琉斯之踵”，如医疗资源向高净值人群倾斜可提升整体救治效率，却违背了公平原则。

2. 测量维度的错位

效率可通过 GDP 增长率、全要素生产率等量化指标精确测算，而公平涉及基尼系数、代际流动率等复合指标。相关数据显示，2023 年全球 GDP 增长 2.7%（世界银行，2024），与此同时，全球最富有的前 1% 人口约持有全球 44%~45% 的财富（瑞士信贷/UBS，2023），增长与分配的量化指标背离，揭示效率与公平之间的内在冲突。

(二) 市场机制的双重异化

1. 马太效应的自我强化

资本回报率（ r ）持续高于经济增长率（ g ）的“皮凯蒂定律”，导致财富向头部 1% 人群加速集聚。美国 1970—2020 年间，1% 顶层人的财富占比从 9% 升至 32%，而同期劳动生产率年均增长 1.8%，形成效率提升与公平恶化的悖反（Piketty & Goldhammer，2014）。

2. 外部性内部化的失灵

外部性内部化是指通过制度安排将生产活动带来的环境损害等社会成本纳入企业成

本，由生产者承担相应责任，以矫正市场失灵。长期以来，市场对环境负外部性的系统性忽视，在钢铁行业表现尤为明显。钢铁行业作为 $PM_{2.5}$ 的重要工业污染源，在粗放发展阶段曾呈现行业效益提升与区域环境质量恶化并存的现象。尽管 2015—2022 年我国空气质量整体大幅改善，但部分钢铁集中区域仍阶段性出现“生产景气、污染加重”的矛盾，反映出环境外部性内部化的长效机制仍未完全建立（中国经济网，2024）。

（三）制度设计的调节困境

1. 税收政策的调节失效

全球顶级富豪实际税率从 20 世纪 50 年代的 45%~70% 降至 21 世纪 20 年代的 20%~25%，资本利得税与劳动所得税的税率差扩大至 20~30 个百分点。OECD（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税收累进性指数从 1980 年的约 0.42 降至 2020 年的约 0.31，制度设计难以有效对冲资本主导的分配失衡（OECD 相关研究，2021）。

2. 社会福利的边际递减

中国中央财政专项扶贫（衔接乡村振兴）资金从 2013 年的 394 亿元增至 2022 年的 1650 亿元，但西部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基尼系数仍维持在 0.41 左右的高位，显示福利再分配的边际效用呈明显衰减（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2022）。效率与公平的冲突本质上是工业文明经济内在矛盾的外显：当资本逻辑将效率异化为单一价值尺度时，资源稀缺性与人类需求无限性的根本冲突便被激化为两种价值的尖锐对立。这种对立不仅在理论场域掀起持久论战，更深刻渗透于经济实践。无论是经济理论研究的范式建构，还是经济实践中的政策权衡，始终交织着效率与公平的价值博弈。

二、理论分野

经济思想史是一场围绕效率与公平价值天平的永恒摇摆。从亚当·斯密笔下的“看不见的手”到凯恩斯笔下的“有效需求”，从马克思对资本剥削的批判到草根经济学对主流范式的挑战，效率与公平的二元悖论始终是经济学理论建构与实践探索的核心矛盾。（Skousen，2007；李义平，2007）

（一）经典经济学的理论分野

1. 斯密的效率至上主义

斯密在《国富论》中以“经济人”假设为基石，提出了“看不见的手”理论，主张个体通过市场竞争自发实现资源最优配置。其核心逻辑是：追求私利的行为会通过价格信号自动协调社会生产，形成“自然价格”均衡，最终增进公共福祉（Smith，1776/2015）。该理论将效率等同于经济增长，推崇自由放任政策，成为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支柱。在 19 世纪工业革命中，英国通过自由贸易和分工实现经济腾飞，验证了斯密模型的短期有效性。然而，1929 年“大萧条”彻底暴露其缺陷，证明单纯依赖市场效率无法避免系统性崩溃。斯密理论的根本局限在于：其一，将“理性人”简化为孤立决策者，忽视群体非理性行为和权力结构扭曲；其二，假设信息完全对称，却无法解释外部和公共品供给困境；其三，静态均衡视角忽视动态创新与制度变迁对效率的长期影响。

2. 凯恩斯的公平调节范式

凯恩斯主义以有效需求不足理论为核心（Keynes, 1936/2024），主张在经济危机中通过政府干预重塑公平与效率的平衡，其政策框架包含三大支柱：一是运用财政政策和累进税制调节收入分配；二是构建社会保障网络，通过失业救济金等缓解贫困；三是强调资本管制，将金融资本收益转化为公共投资。然而，该范式面临结构性矛盾：过度依赖赤字财政导致 20 世纪 70 年代“滞胀”，失业率与通胀率同时突破两位数，20 世纪 80 年代后资本利得税降至普通收入税率的 1/3，美国前 1% 的人群财富占比从 15% 飙升至 32%；验证了菲利普斯曲线失效（Phillips, 1958），揭示了资本权力反噬下公平与效率的再失衡。

3. 马克思的公平批判理论

马克思的公平批判理论以剩余价值学说为核心（马克思, 2004），揭示了资本主义制度下效率的剥削本质：资本家通过延长劳动时间无偿占有工人创造的剩余价值，形成“效率至上”的假象。市场交换的等价原则掩盖了资本对劳动的支配关系——工人的工资仅占劳动成果的极小部分，剩余价值被资本家无偿占有，导致财富分配的两极分化。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的公平本质上是形式平等下的实质剥削，其效率提升以牺牲劳动者权益为代价。例如，工业革命时期英国工人日均工资仅增长 12%，而资本利润率却飙升 400%（Dauntton, 2011）。为解决这一矛盾，马克思主张通过制度革命建立公有制，消灭阶级剥削，实现“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公平社会。但历史实践显示，苏联成立后，建立公有制，推行计划经济模式，虽保障了基本公平，却因行政干预抑制创新效率，全要素生产率增速从 20 世纪 50 年代的 4.2% 降至 20 世纪 80 年代的 1.8%。当前中国探索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则试图通过“有效市场+有为政府”的结合，在公有制为主体框架下激活市场活力，为马克思公平理论提供了新的实践注脚。

（二）当代理论的范式冲突

1. 主流经济学的效率迷思

中国改革开放后奉行“效率优先”策略，通过市场化改革释放增长动能，1978—2012 年 GDP 年均增速达 9.8%，但代价是全国居民收入基尼系数从 1978 年的 0.317 升至 2012 年的 0.474（国家统计局, 2023），前 10% 家庭资产占比达 47%（中国人民银行, 2023），城乡医疗支出比扩大至 3:1，验证了单纯依赖市场机制的公平缺失。主流经济学将“先富带动后富”视为帕累托改进，却忽视其理论假设的理想化色彩：市场交易虽能提升总效用，但无法解决权利初始分配不均、外部性（环境污染）及代际贫困固化等问题。库兹涅茨曲线描述的“倒 U 型”收入分配规律在中国呈现阶段性异化——1990—2008 年基尼系数持续攀升，2008 年达峰值 0.491，远超国际警戒线；虽 2009—2012 年逐步回落至 0.474（国家统计局, 2023），但仍处于高位，表明市场自发调节未能实现公平收敛。这种效率至上的迷思源于三重理论缺陷：其一，将效率简化为 GDP 增长，忽视社会福利分配；其二，以理性人假设遮蔽权力结构对资源配置的扭曲；其三，用数理模型遮蔽价值判断，导致政策偏向资本收益而非人力资本投资。在中国医疗、教育等公共服务领域的市场化改革中，市场力量对公共品供给的挤出效应印证了埃奇沃思方块揭示的“效率—公平不可分性”——单纯市场机制无法兼顾社会合理价值（Edgeworth, 1881）。

2. 草根经济学的公平关切

草根经济学以批判新自由主义范式为核心，既揭示了“华盛顿共识”在拉美引发的债务危机（Williamson, 1990）——20世纪80年代该地区外债与GDP比值从43.7%（1980年）攀升至58.9%（1987年）（世界银行，2023）；也指出了中国市场化改革中“产权神话”的实践困境，如1998—2003年国企改革期间，累计造成约2800万职工下岗（国家统计局，2023）。它主张通过“社会所有制”重构平衡效率与公平，这一理念的制度创新集中体现在浙江“共同富裕示范区”的试点上：2023年浙江省级财政加大对山区26县转移支付（1103.2亿元），通过GEP核算生态补偿试点，推动城乡收入比从2.04:1（2020年）降至1.86:1（2023年）；同时创新产业链利润共享机制，鼓励龙头企业向中小微主体让利，带动数万家小微企业显著增收。这种实践形成了“市场嵌入调节”机制，突破了新古典经济学中市场与政府的二元对立，为兼顾效率与公平提供了可落地的嵌入式发展范式。

效率与公平的范式之争本质上是经济哲学的价值排序问题。从斯密的自然自由到马克思的制度革命，再到当代理论的融合尝试，经济学始终在寻找资源配置与社会正义的满意解。

三、实践探索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经济政策始终在效率与公平的动态平衡中探索前行，历届领导集体基于不同历史阶段的矛盾特征，形成了具有时代特色的治理逻辑。这种调整既是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继承发展，也是对“效率—公平”二元悖论的本土化实践。

（一）1949—1978年：计划经济下的公平优先

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构建计划经济体系，通过统购统销与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集中资源推动工业化。国家以低价收购农产品、高价供应工业品，形成资源向重工业倾斜的分配机制，1952—1978年累计从农业净转移资金约3000亿元（林毅夫等，1994；王积业，1996）；支撑粗钢产量从1949年15.8万吨增至1978年3178万吨（国家统计局，2024），建成鞍钢、一汽等工业标杆。社会领域初步建立城乡低水平保障体系：城镇实行公费医疗与劳保医疗，农村普及合作医疗，推行免费义务教育与福利分房；城镇基尼系数长期低于0.2，农村约0.21~0.24，收入分配高度均等化。但计划经济导致微观活力不足、企业缺乏自主权，1952—1978年国营工业全要素生产率年均微负增长（约-0.2%~-0.3%）。价格体系严重扭曲，农产品价格低于价值20%~40%、工业品高于价值10%~30%，居民消费受抑制，1978年居民消费率约49%，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仅311元，生活水平提升缓慢（国家统计局，2024）。这一模式虽建成完整工业体系，却陷入短缺经济困境，为改革开放埋下伏笔。

（二）1978—1992年：效率优先的破局之道

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为指导，通过价格双轨制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打破计划经济桎梏，开启市场化转型。价格改革方面，1984年莫干山会议确立“调放结合”原则，工业品价格逐步放开，刺激生产资料产量

年均增长 12%，但双轨价差催生投机倒把，1988 年“价格闯关”引发全国性抢购潮，通胀率飙升至 18.8%，倒逼 1993 年全面市场化并轨（中国经济周刊，2018）。农村改革中，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安徽凤阳小岗村率先突破，1982 年中央一号文件确认其合法性，至 1984 年实现全国覆盖，粮食总产从 3 亿吨增至 4 亿吨，农民人均纯收入从 134 元增至 355 元，乡镇企业异军突起，1992 年吸纳农村劳动力约 1.01 亿人，总产值占社会总产值 25%、占 GDP 约 18%（国发〔1992〕19 号，1992）。深圳特区通过土地有偿使用、外资准入放宽等政策，GDP 从 1979 年 1.96 亿元增至 1992 年 317.32 亿元（深圳政府在线，1993），年均名义增速约 37%（深圳新闻网，2021），示范效应推动全国设立 14 个沿海开放城市。这一阶段 GDP 年均增长 9.5%（国家统计局，2024），城镇化率从 17.92% 提至 27.46%，但效率优先导致基尼系数从 0.31 升至约 0.42，城乡收入比从 2.57:1 扩大至 2.58:1，分配失衡问题开始显现，为后续兼顾公平的改革埋下伏笔。

（三）1992—2002 年：效率主导下的初步调节

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以“抓大放小”国企改革为核心推动效率跃升：1995—2002 年国有工业企业户数从 7.76 万户减至 4.19 万户，实现利润从 838 亿元增至 2209 亿元，国有经济占 GDP 比重从约 40% 降至约 35%。通过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实施“三改一加强”，推动国有企业扭亏为盈，1999 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 52%，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利润增长 77.7%。2001 年加入 WTO 后，我国外贸依存度从 1993 年的 32% 跃升至 44%，1992—2001 年出口额年均增长 13.6%，连续 9 年位居全球发展中国家吸引外资首位，人均 GDP 突破 1000 美元，2002 年互联网用户达 5910 万。在公平调节方面，启动西部大开发战略，2000—2002 年中央财政对西部地区转移支付约 3000 亿元；启动农村税费改革试点（2000 年安徽试点、2001—2002 年全国扩围），着力减轻农民负担；建立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制度，2002 年养老保险覆盖 1.1 亿人、医疗保险覆盖 9400 万人。但调节力度仍显不足：2001 年全国基尼系数约 0.45~0.49，城乡人均医疗支出比扩大至 3.55:1，收入与公共服务差距持续扩大。这一阶段通过“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制度设计，既释放了市场化活力（1992—2002 年 GDP 年均增长 9.6%），也为后续系统性公平改革奠定基础。

（四）2003—2012 年：均衡发展的制度探索

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推进统筹协调与公平托底。科学发展观以“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为核心，在保持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系统推进城乡统筹与社会保障改革。城乡统筹方面，新型农村合作医疗 2008 年实现全覆盖、参合率达 91.5%；中央财政补助标准从初期人均 20 元逐步提高至 2011 年 200 元；2003—2012 年累计补偿医疗费用约 4500 亿元；2011 年政策范围内住院报销比例达 70%。家电下乡政策截至 2012 年底累计实现销售额约 7071 亿元，惠及约 2.5 亿农户。2006 年全面取消农业税，年减轻农民负担 1335 亿元，并建立农业“四补贴”制度，2011 年补贴总额达 1406 亿元。社会保障领域，2007 年建立农村低保制度，覆盖 3452 万人，月人均补助约 30 元，2012 年提高至 104 元；农村义务教育“两免一补”政策覆盖 1.5 亿学生，2012 年新农合参合率

升至 98.3%。经济调节上, 2003—2012 年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从约 1.6 万亿元增至 4.02 万亿元, 增长约 1.5 倍, 其中约 40% 投向中西部地区, 推动东部与西部人均 GDP 比值从 2003 年 2.65:1 降至 2012 年 1.87:1; 研发投入强度从 2003 年 1.13% 提升至 2012 年 1.97%。成效上, 2011 年 GDP 突破 47 万亿元, 城镇化率达 51.3% (国家统计局), 城乡居民收入比从 2009 年 3.23:1 降至 2012 年 3.10:1, 全国基尼系数从 2010 年 0.481 降至 2012 年 0.474。这一阶段通过“减负+托底+升级”的制度组合, 在高速增长中推进公平, 为深化改革奠定基础。

(五) 2013 年至今: 高质量发展导向的再平衡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以“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新发展理念为指引 (习近平, 2017), 通过构建“双循环”新格局, 开创了效率与公平协同共生的现代化新路径。在效率维度, 以数字技术革命重构生产函数, 2023 年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为 9.9% (国家统计局, 2024), 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贡献率约 40%~43% (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 2023); 智能工厂建设推动生产效率平均提升 22%~30%, 有效提升资源配置效能。公平领域则通过制度创新筑牢保障体系: 2013—2020 年脱贫攻坚消除 9899 万农村绝对贫困人口 (国家乡村振兴局, 2021), 城乡居民收入比从 2012 年 2.88:1 降至 2023 年 2.39:1 (国家统计局, 2024), 2023 年全国基尼系数为 0.467, 收入差距持续小幅收敛。生态治理方面, 2012—2023 年单位 GDP 能耗累计下降约 26%, 可再生能源发电装机占比达 51.9% (国家能源局, 2024), 绿色发展成效显著。反腐败斗争保持高压态势, 党的十八大以来查处省部级及以上干部近 500 人, 政治生态持续净化。这种“有效市场+有为政府”的协同机制, 在 2020 年全球经济衰退背景下实现中国 GDP 增长 2.3% (国家统计局, 2021), 验证了效率与公平的辩证统一——既非新自由主义的效率至上, 亦非福利主义的公平陷阱, 而是通过制度弹性包容多元价值、技术革命重塑分配逻辑, 在动态平衡中实现高质量发展的中国方案。

四、在效率与公平的辩证统一中开辟发展新境界

新中国 70 多年经济变革史本质上是效率与公平的辩证探索。计划经济时代追求绝对公平却抑制效率, 新自由主义推崇效率却加剧失衡, 二者均陷入单一价值取向的困境。技术革命催生新范式: 浙江部分“未来工厂”(如宁波东方电缆) 依托 5G+区块链实现核心生产数据全流程上链, 生产效率提升约 37.5%, 产品与质量环节可追溯, 在提升效率的同时强化分配与权益保障; 长三角工业互联网平台体系连接数万家制造企业, 推动区域产能共享利用率提升约 5~8 个百分点, 优化资源配置。这些实践印证了 Sen (1999) 的“以自由看待发展”理念——数字经济下, 农民主播群体收入分化明显: 头部/腰部主播收入显著高于外出务工, 尾部主播收入与务工基本持平, 整体高于传统农业收入; 以浙江衢州为代表的碳账户体系, 将个人与企业绿色行为量化为碳积分, 转化为可融资、可优惠的信用资产, 标志着效率与公平从对立走向融合。中国道路的突破在于: 以制度弹性包容多元价值, 用技术革命重构分配逻辑, 在动态平衡中实现高质量发展。这种东方智慧超越市场原旨与计

划回归的二元对立，为全球治理提供制度与技术协同的第三路径。



思考题

1. 概念辨析题

如何理解“资源有限”与“欲望无穷”之间的辩证关系？请结合中国“双碳”战略说明二者矛盾的化解路径。

2. 理论比较题

对比西蒙“满意性原则”与传统经济学“最优化原则”的理论逻辑，结合企业产品定价策略，分析两种原则在实际应用中的优势与局限性。

3. 现实应用题

中国“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如何通过制度设计来平衡效率与公平？请结合实践说明理论落地路径。

4. 延伸思考题

人工智能（如 ChatGPT）的决策逻辑是否符合“有限理性”假设？请以“AI 信贷审批算法”为例，讨论其可能引发的公平性争议。

5. 批判性分析题

部分观点认为“助推”理论在政策实践中可能存在“家长式干预”的风险，限制个体决策自由。请结合具体政策案例，批判分析“助推”理论的这一争议点。

6. 案例分析题

以某互联网企业的“996”工作制争议为例，结合“契约关系”理论，分析企业与员工之间的权利义务失衡问题，并提出解决思路。

7. 跨学科视角题

中国“熟人社会”中的关系型契约（如民间借贷）如何突破“主体对等性”假设？请结合实例进行阐释。

8. 开放性试题

针对当前一些年轻人“躺平”现象，有人认为是“欲望降低”的表现，也有人认为是“资源获取困难”导致的无奈选择。请结合经济心理学理论，提出解决这一现象的政策建议或社会干预方案，并说明理论依据。